新时期论坛

红船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

□ 梁言顺

94年前，在嘉兴这片热土上，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从这里扬帆起航。嘉兴、南湖、红船在习近平总书记心目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分量。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一书中，开篇之作是2002年10月22日习近平同志赴嘉兴市调研并瞻仰南湖革命纪念馆时的讲话，收官之作则是2006年6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嘉兴市南湖召开浙江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为牢记党的历史，弘扬和传承中国革命精神，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重要文章，首次提出红船精神，并把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特别强调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它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的最大梦想，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个梦想，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刻。从五百年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一个国家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大概有5—10年的时间是一个必须经过的爬坡过坎的关键期。这个时期，我们身处的国际环境更为复杂，面临的国际竞争更为激烈，可谓“上踹下拽，左挤右绊”。这个时期平稳过去了，站稳了脚跟，向上攀升的空间就会显著增大，再被打成二流的国家也不容易；过不了这个坎，发展的历史机遇就会丧失。

我国自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这个关键期特征十分明显。我们近几年在国际上遇到的各种麻烦，大多都发生2010年以后。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都与此有关。最典型的是亚投行问题，个别国家千方百计设置障碍，极少数国家与之一呼一应，小动作不断。

根据研究，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要持续10年左右，即从2010年到2020年左右。

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还要全面从严治党，为全面建成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在这期间，我们会遇到从来没有遇到的问题，做从来没有做过的事，而且我们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因此，尤其需要发扬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敢于突破前人，自觉克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坚持用创新的理论成果武装头脑，用创新的思想观念谋划工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开辟共产党人的新天地。

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想得到和想不到的风险和考验，我们将面临各种各样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陷阱和暗礁。历史表明，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动摇信仰信念，因此，尤其需要发扬“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共产党人的胸襟和眼界观察世界，判断形势，不怕艰难，坚忍不拔，矢志拼搏，艰苦创业，将党的事业进行到底。

习近平同志指出，依水行舟，忠诚为民，成为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全过程的一条红线，也是红船精神的本质所在。关键时期，尤其体现人民的力量，尤其考验共产党人的人民性。因此，我们尤其需要发扬“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努力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总之，自建党以来，红船精神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党坚持站在历史的高度，走在时代的前列，勇当舵手，引领航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必过万重山。我们有理由相信，“红船精神”会继续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党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走向新的更大的辉煌。

我们今天弘扬红船精神，根本意义在此。

（本文是中共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科研部主任梁言顺同志在“红船精神”研讨会上的发言，略有删节）



来自嘉兴南湖的“红船”，成为中央党校学员党性教育的生动教材 张 永 摄

理论研究

文化创生需要培育中性智慧

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同，中性思维方式立足于建设，强调事物对立双方的互养相成、共生共存，强调把握事物的平衡支点，做到不偏不倚、允执厥中。

□ 邹广文

文化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生新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前提。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想生生不息，就不但需要考虑文化“现在如何”，更要考虑文化“将来如何”。所以，有效摈弃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思维定式，培育一种有利于文化健康成长的中性智慧，以包容的心态促成不同文化相互借鉴、互养相成，就变得十分重要。

众所周知，文化相对主义是全球化时代后发展国家的主流话语。不容否认，作为对于普遍主义的矫正，文化相对主义突破了西方中心的话语模式，尊重差别，肯定了异质文化的多元存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重现。但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中也潜藏着一个悖论：如果所有的文化系统都囿于自身的价值标准，认定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最优秀的文化并固守自己的文化方式，盲目排斥甚至压制其他文化，则必然造成文化孤立，甚至会导致文化的涣散，不利于人类的文明积累。这样我们看到，文化相对主义走到极端，客观结果与文化普遍主义的价值诉求一样，都不可能使人类的文明获得健康的发展和积累。

无论是文化相对主义还是文化普遍主义，都不应在极端的意义上推广实践其价值。全球化的合理性呈现应该是文化和谐共生。这就需要世界各民族摒弃两极对立的极限思维，代之以和谐共生的中性智慧。人类的智慧源于生活实践中的思考，不同思维方式往往导致不同的智慧形状，中性智慧的体用源于中性智慧方式对生活世界的实践审视。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同，中性智慧方式立足于建设，强调事物对立双方的互养相成、共生共存，强调把握事物的平衡支点，做到不偏不倚、允执厥中。毫无疑问，中性智慧重在对于对象世界的整体性、动态性把握，它是一种生成性思维而不是现成的实体性思维。

中性智慧是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的突出特点。在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中，中性智慧是最为丰厚的资源，亦可说是中国人独具特色的生存智慧和处世态度。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都把“中”与伦理道德、人生观、价值观相联系，以至将其升华为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中庸”“中道”“中和”，这些概念构成了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其突出的思想特征便是“中”。统揽孔子的思想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中性智慧贯穿于各个层面：“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天人合一”的哲学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内圣外王”的人格模式等等，孔子的中庸哲学对中华民族精神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把中庸称为“至德”。孔子的中庸之道，就是反对“过”与“不及”，要在“过”与“不及”的两极之间把握一个适中点，以保持事物的常态不变。孔子反对过分的拘泥，“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说，孔子坚决拒绝过分的臆断与固执己见的极端行为；而且孔子还认为对“中”的把握，可以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他将此称之为“君子而时中”。可见，孔子的儒家思想很好地贯彻了中性智慧模式。

中性智慧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本质精神的应有之意。第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价值取向就是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这是一种动态的、生成性思维。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人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只有从人的现实生活情势出发，我们才不至于陷入既定的、僵化不变的思维定式，我们的理论才有可能真正全面地表达时代与生活。第二，唯物辩证法决不是让人们的思维简单化、对立化，相反，它是让人们在看待事物时更加理性、更加全面、更加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要求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去观察事物，把握其发展态势。所以，以中性的思维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历程。

今天，人类的文明走到了十字路口，尤其是在人类的技术工具理性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刻，人类必须认真反省自己当下的这种思维定势。值得注意的是，在2500前的人类文化“轴心时代”，东西方思想家都曾经阐发过这种中性智慧。中国的孔子中庸思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中和智慧可谓是其突出代表。在孔子的思想中，“中庸”兼容了“体”（本体论）与“用”（方法论）的双重意蕴，是对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融会贯通，将“中”理解为“性”或“道”，将“庸”理解为日常的实用理念，而“道”与“器”是缺一不可，不可分离的。从本体论上看，它是人生探求的终点，具有深不可测的权威意义；从方法论上看，它与我们一起生长在日常生活中，平常到成为随时可以使用的处事方式，兼有高远之极与常见之极的特质。

遗憾的是，先哲的这种中性智慧基因并没有在人类现实社会生活层面得到培育并发扬光大。所以，今天我们倡导中性智慧，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种基于人类未来关怀的价值重建。如此，既可以使古老的东西方智慧在消弭极端思维方式的跨文化对话中得到应有的尊重，又可以人类文化在新的创生平台上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应自觉将中性智慧向现实文化生活领域拓展和推广，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确立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新思维。全球化发展时代的到来，要求人们从两级对立思维定式向中性智慧转变。也许正是在文化封闭的状态被打破之后，在全球文化的关照下，各种文化形态都重新发现了自己文化的根，人们才真正地认识到，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可能比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还重要，因为文化多元化发展是世界文化丰富多彩的基本前提。只有坚持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思维，才能在实践中有效地抵制文化霸权，保持世界文化发展的平衡性与生动性。

第二，培育“和而不同”的文化交往原则。我们这里讲的“和而不同”原则是文化多元化思维的现实实践要求。“和而不同”原则是中国儒家代表孔子的重要思想主张，“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在于：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所以在中华文化在与世界文化的交往中，应以我为主，倡导平等交往和对话，在沟通中取得共识。显然，这种“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坚持“和而不同”原则，就能有效实现“促进全球文明，光大民族文化”的目的。

第三，着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是一个老问题，然而却是一个常忆常新的问题，这一问题也许将伴随中国整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文化个性化培育的视角要求，就是如何将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转化成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价值资源，进而对世界文化做出独特的贡献。在当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需要在与外部环境、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中才能得到锤炼和发展。保护传统文化，并不是像对待古文物那样把它与周围世界隔绝开来，相反，一种文化只有与时代相适应，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既不断地更新和发展，又不失却自身传统的特色，这才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一种根深叶茂的文化。

党的思想史

延安大学习与“建设大党”

延安大学习是与党中央“建设大党”的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在学习中坚持和实行的一系列原则、理念和方法，对于当前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开展学习型政党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吴文珑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勤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突出政治优势。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实现自身力量的逐渐发展壮大，不断推进革命事业走向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坚持不懈地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开展的全党范围的大学习，就是党的历史上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干部理论水平、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的一个成功范例。

延安大学习是与党中央“建设大党”的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他说，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今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演说中，又明确提出了要“建设大党”的理念。他说，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可见，此次大学习，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中国共产党而发起的。延安大学习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938年10月至1939年12月，学习动员和兴起阶段

在该阶段中，党中央对学习的内容、方法和机制作出了详细规定，学习在各学校、机关单位初步展开。1939年，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后改称中央宣传教育部）并创办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以加强统一领导。中央作出指示，强调“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应经常开办各种干部训练班，应以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党的建设与游击战争作为教育计划的中心内容”，“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印各种关于马列主义的刊物与书籍，组织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会与读书会等”。具体说来，在有关学习的内容、方法和机制上，“党、政、军、民、学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要坚持“每日二小时学习制”，“理论与实际一致”，“勤学者奖，怠惰者罚”；同时，“各级机关、学校、部队均设干部教育领导机关与人员”。对此，李维汉强调，干部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学习一些初级、中级、高级课程。初级的课程为党的建设、中国问题、游击战争与社会科学常识；中级的课程为近代世界革命史、联共党史与马列主义，以及军队政治工作；高级的课程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共产国际纲领与军事理论。陈云对理论学习的方法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如“一本一本书读懂的办法很重要”，“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读书要做笔记”，“读书要与懒惰作斗争”等。在这种详细的引导布置安排下，大学习得以顺利开展起来。如边区政府就根据每一个同志的文化水平，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学习联共党史，乙组学习党的建设，丙组学习《解放》上发表的专论和社论，参加讨论的同志，发言非常积极。此外，各中央直属学校、八路军政治部、后方勤务部、统战部等单位均积极响应中央号召，采取开展学习检查、成立学习委员会、工作生产学习军事化等不同方式，推动学习顺利进行。

1940年1月至1941年5月，学习正规化和提高学习质量阶段

在学习正规化方面，1940年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经常注意检查党校和干部训练班的工作。指示进一步规范了学习的主要课程，规定：干部学习的初级课程包括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中级课程包括联共党史、马列主义；高级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2月15日，党中央再次作出指示强调，为了巩固与发展党，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指示还对不同层次党校的学习内容、学习计划、学习时间等作出了详细安排。为专门规范在职干部的教育活动，党中央发出了补充指示，要求将现时的在职干部大致分为四类，其中，甲类的课程有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乙类则是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同时并进，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丙类则包含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丁类将文化课与党建同时并进。党中央的指示还规定了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在提高学习质量方面，党中央明确指出，“提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质量，是当前干部学习中的一个中心任务”。为此，必须培养干部独立阅读和独立研究的能力与习惯，加大学习各种具体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力度，同时注重编辑与出版中级读物及辅助读物。在该阶段中，加强策略教育、增进干部的学习能力及独立思考能力是提高学习质量的重要手段。党中央在相关决定和指示中强调，“全党必须加强进行策略教育，克服干部的单纯化现象，应把这种策略教育列入干部教育的正式课程，作为成绩考查的重要标准”，“必须在全党的在职干部教育中，党校和党的训练班中，及党领导的各种干部学校中，把党的策略教育列入正式教育计划之内，并作为成绩考查的重要标准”。此外，组织开展学习检查、系统总结学习经验对推动深入学习也起到了积极作用。1940年7月1日，李维汉对延安在职干部一年来的学习经验进行了总结；几乎与此同时，留守兵团直属队、陕北公学等单位也相继开展了学习经验总结会。通过学习检查和经验总结，明确了成绩和缺陷，规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改革和完善阶段

鉴于大学习开展以来延安干部学校中存在的分工、职责不明确的情况，1941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明确规定：中央研究院主要“培养党的理论干部”；中央党校主要“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军事学院主要“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主要“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与中级的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1942年2月28日，中央又颁布《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干部教育应以在职干部教育为主体，它“应该是第一位的”。决定同时规定，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理论教育四类为范围。在中央上述决定的指导下，延安大学习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干部学习更加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延安大学习在延安整风全面开始后，被纳入到整风运动的轨道进行。总体上看，这次大学习是党的学习史、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大学习推动了党的思想建设，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党性，大大提升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的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的党员后来回忆说：“我过去心中只有一个字，就是干。从进中央党校开始，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为以后更好地工作和学习奠定了理论基础。”还有的学员回忆说：“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学习，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它不仅使学员受到了初步的马列主义基础教育，而且为以后的自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不但如此，这次大学习还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延安大学习不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还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党在学习中坚持和实行的一系列原则、理念和方法，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解决实际问题；加强对学习的组织、指导和服务，建立和完善促进学习、保障学习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包括党校在内的各类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在“建设大党”中的作用等，对于当前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开展学习型政党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